



我国医学教育标准和认证体系实现国际实质等效

万象

中青报·中青网记者 叶雨婷 实习生 李凯旋

一场突如其来的新冠肺炎疫情，让一个大学生群体备受关注，那就是医学生。而在光环背后，这些大学生经历的不仅是上课和考试，承担的不仅是学业的压力，还需要带着悲天悯人的大爱，以超过常人的耐力和勇气去面对一个关于生命的挑战。

不久前，教育部临床医学专业认证工作委员会以“无条件通过”成绩正式获得世界医学教育联合会(WFME)医学教育认证机构认定。这标志着我国医学教育标准和认证体系实现国际实质等效，医学教育认证质量得到国际认可。在这之后，教育部临床医学专业认证工作委员会公布了截至2019年年底临床医学专业通过认证的普通高等学校名单。一步步的大动作，都预示着未来我国医学教育发展将有大跨越。

又到了一年高考志愿填报季，在这样的背景下，不少医学界人士都在期待越来越多的新鲜血液能够输送进来。而如今的医学生们，也在用他们强大的内心和博爱跨过又一个坎。

“我为什么学医”

他们为什么选择学医？中青报·中青网记者在采访多位医学生后发现，自己或家人的生病经历、家庭背景、家人职业的影响都会成为医学生们选择这条神圣道路的原因。

“12岁的时候，我的姥姥不幸罹患了癌症，看着她被疾病折磨，我感到无能为力，当时我就想要立志学医，帮助我的亲人。”说起自己为什么学医，北京大学医学部2016级临床医学专业学生韩乐这样说。

韩乐表示，从小妈妈就告诉他，医生



6月29日，北京大学医学部2020年毕业典礼，毕业生身着白衣，重温医学生誓言。

北京大学医学部供图

是一个神圣而高尚的职业。在经历过姥姥的事之后，他在大学中研究那种肿瘤的发病机制，写了一篇综述并向国际知名的肿瘤学杂志投稿。“我希望自己在未来继续研究恶性疾病，为人类战胜这些疾病添砖加瓦。虽然姥姥没能看到我进入北大医学部，但我还能帮助更多的人缓解病痛。”

而对于韩乐的同学刘定超来说，选择学医的契机源于自己的一次生病经历。

“我在高三上学期生了一场病，开始只是感冒发烧的症状，后来越来越严重，不得不住院、休学。我之前从没住过院，也是在住院过程中第一次产生了学医的想法。当时我感觉医生可以跟很多人沟通，在治愈病人的过程中也会得到很高的成就感。”刘定超说。

高考之后，刘定超在填报志愿的时候有不少选择，其中包括计算机、自然科学等专业。在当时的关口，他也曾十分迷茫。“因为一个选择就会决定你今后从事什么职业。但我在决定选择医学以后，发现自己不再有迷茫的感觉了，我觉得我就是想当医生。最终我只填报了一个志愿，就是现在我所在的学校。”

什么样的学生会选择学医？全国医学教育发展中心在2019年10月发布的《中国临床医学专业人才培养与发展调查报告》(以下简称《报告》)显示，对于临床医学教育，城乡学生在入学机会上存在较为明显的差异，城市学生在进入长学制、进入更高层次医学院校上具有较为明显的优势。

此外，《报告》显示，29.21%的学生表示自己的父母或直系亲属中有人学医或在医疗卫生单位工作。相比全国本科学子群体，这些学生中，高中来自重点高中或示范高中的比例明显更高，在专业录取上第一专业录取比例明显更高，且有着较为明显的高学历愿望，有接近一半的学生表示在高中时期就将医生作为自己的理想职业，有超过60%的学生在报考临床医学专业时对该专业有不同程度的了解。

“下一次疫情来了，就是我上”

如果说医学生和其他专业的大学生有什么不同，那可能是他们总能在专业学习中找到关乎生命的大爱。一次新冠肺炎疫情

情，让社会各界看到了90后新生从医群体的青春力量，也让不少医学生深有感触。

“假如以后我当了医生，类似的疫情再次出现时我会冲到前面，这是我的使命。”刘定超表示，这次疫情让他感受到了中国医生的特质。“在疫情肆虐的情况下，有那么多医疗工作者主动冲向前线，他们会这么做，不只是因为国家的号召和激励，还觉得自己有责任去这样做，他们的事迹给了我深深的感触。”

来自西安医学院临床医学专业的涂姝祺也有同样的想法。“以前对奉献精神只是耳边听一听，也不知道如果我面对那样的情况会如何选择。经历这次疫情，我知道自己在真正面对的时候，肯定会毫不犹豫地选择去前线。这是一种职业的本能，在那一瞬间你不会有其他想法。就像军人要上战场，有些事情必须由我们来做。”

如今，越来越多的医学生选择从医。

7月9日，麦可思研究院发布的《2020年中国大学生就业报告》显示，医学本科生从医比例从2015届的87.4%上升到2019届的91.5%，医学高职生从医比例从2015届的85.7%上升到2019届的89.0%。从就业所在地区来看，医学生到中西部从医的比例也持续增加。其中，医学本科生到中西部从医的比例从2015届的41%增长至45%，医学高职生到中西部从医的比例从2015届的53.3%增长至56.9%。

然而，近年来屡屡在网络上热议的医闹、伤医事件，也让医学生遭受了很大的精神冲击。

涂姝祺大一时在学校附属医院当导医，曾经在儿科看到一个孩子发高烧，家长情绪比较激动，一直在骂医生和护士。“因为儿科工作很繁重，那个医生一下午就挂了160多个号，根本看不完。有些医生不理解医院的规则，这是产生冲突的原因之一。医患冲突也是医生必须面对的一种困难。”

《报告》指出，选择临床医学专业的学生群体中，对当下从业环境持消极态度的学生比例高于持积极态度的学生，这一结果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学生的医学职业理想和学医决心。但是从学生报考临床医学的动机来看，整体上外在动机相对较为

明显，而内在动机略显不足，医生职业就业稳定是学生报考临床医学专业最主要考虑的因素。

医学教育的未来，不止于此

教育部临床医学专业认证工作委员会以“无条件通过”成绩正式获得世界医学教育联合会(WFME)医学教育认证机构认定，这引起了社会的广泛关注。

对此，教育部高等教育司负责人表示，通过了WFME的机构认定，中国医学毕业生有了学位互认的一张国际通行证。“这表明中国临床医学认证工作委员会所认证高校的医学教育质量得到了国际认可，为中国医学毕业生跨境流动提供了一张入场券”。

而在教育部临床医学专业认证工作委员会主任委员、北京大学医学部副主任王维民看来，这带给中国医学教育的不仅是一张国际入场券。

“临床医学专业认证的实施带给中国医学教育的影响是多方面和深层次的，在医学教育更新发展理念、持续推进教学改革、夯实并不断提升人才培养基本质量、建立自我质量保障体系、构建国际实质等效的医学专业认证制度等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王维民说。

在这之后，教育部临床医学专业认证工作委员会公布了截至2019年年底临床医学专业通过认证的普通高等学校名单，共完成了105所院校的专业认证的现场考察和36所院校的前期考察。不少专业人士认为，让更多的学生学医、从医，不仅需要情感和信念支撑，还需要完善的学科建设、友好的社会环境、通畅的发展通道。

王维民表示，未来我国的医学教育专业认证面临着新的发展机遇。建立国家医学教育的认证制度是保证医学教育整体质量的关键。

“医学教育包括院校教育、毕业后教育和继续教育三个阶段，目前我国临床专业认证还只是在院校教育阶段实施，尚未在毕业后教育和继续教育阶段开展。这是我们亟待弥补的短板。建立毕业后教育和继续教育的教育标准也属于当务之急。”王维民说。

王维民表示，健康中国战略对医学教育和医学的发展提出了很高的要求，同时又是未来发展的方向。“至于医生的待遇和医闹等问题，应该是短期性的，随着民众素质的提高和对健康需求的提升，应该会有好转，前途是光明的。对于中学生讲，如果你喜欢做医生，愿意为人类的健康贡献聪明才智，那么，投身医学事业是个不二的选择”。

中青报·中青网记者 王海涵 王磊 通讯员 韦豹

新时代劳动教育有“泥土”还要“破土”

暑假临近，合肥市五一小学的“网红地”迎来了又一茬蔬菜的丰收——红彤彤的辣椒、绿油油的青菜，让守候多日的同学们兴奋不已。

这块占地半亩的“百草园”面积不大，但是上面的种植从未间断。大家亲自动手，以班级为单位，认领“责任田”，不仅种中草药，还种莴菜、白菜等蔬菜，并且每个班级都有自己的“班花”和种植口号。

如果到了蔬菜瓜果大丰收的金秋时节，会是另一番热闹景象。同学们带着秤和袋子，将自己种植的蔬菜“售卖”给老师，收入则用作班费，这个活动被称作“丰收节”。

从校名上看，五一小学似乎与“劳动”二字有着不解之缘，但是真正的结缘始于2005年。当时学校操场尚未建成，留有一片闲置空地，学校索性发动学生学种山芋、花生、蚕豆。时至今日，操场建起来了，标准化设施建设日渐完善，但学校还是专门开辟出一块生态田园，让种菜的劳动习惯接续下来。

后来，五一小学成为进城务工人员子女定点学校，全校1000余名学生中，进城务工人员子女占60%，不少学生的父母文化程度不高，平时忙于生计，对孩子学习情况、标准设施建设关注不够，不能充分参与到“家校共育”中来。

为破解这一难题，该校创新德育理念和载体，践行“生活教育”“劳动教育”理念，15年来，始终坚持开展劳动教育，引导孩子尊重劳动、崇尚劳动、热爱劳动，把劳动内化成生活的习惯，同时以劳动为纽带，把家长拉入家庭教育的轨道中来。

在少先队大队辅导员王淑君看来，除了种菜，学校一直创造机会让孩子们接触劳动。“青青百草园”社团是该校的明星

社团，每年报名都很火爆。学生们种植芍药、薄荷、金银花等中草药。学生组成小队，每天对作物进行养护巡查，并进行记录。这不仅培养了劳动技能，也让孩子们对中草药知识和相关功效有了更深入的理解。

标本如何采制、采集哪些部分，这些都有讲究，学校请安徽中医药大学的老教师来指导，并带着孩子们做扦插实验。标本进行烘干时，由于没有烘干机，孩子们就小心翼翼地用报纸反复盖在标本上，一遍遍地进行吸水，十分爱护。该社团还组队参加团合肥市委举办的“红领巾小创客”活动，孩子们会亲手配制的香囊、中草药标本、植物等带去义卖。辛勤的付出，让他们深刻意识到劳动成果的来之不易。

在五一小学，即使一年级的学生，也有劳动项目，那就是“生活自理能力大比拼”，让孩子们自己系鞋带、收书包、收

拾桌子，并且每天回家劳动10分钟。“这是培养生活自理能力的重要阶段，老师不仅要教会他们学习，更要教会他们生活，增强动手能力。”该校校长程朋军介绍。

很多学生在劳动中学会感恩。王淑君记得，有一年“三八妇女节”，孩子们主动给妈妈送礼物，有人做手工贺卡，有人给妈妈洗脚。五年级的孙子俊给妈妈发了短信，提醒妈妈，晚上一定要回家吃饭，自己要准备一个“惊喜”。

那天，孙子俊做了一碗蛋炒饭，虽然因为多放了酱油，黑漆漆的，但上面精心点缀了黄瓜丝，拼成“妈妈”二字。妈妈到家太晚，儿子已经睡着了。看到这碗蛋炒饭，她专门给老师发了一个短信：“从来没想到儿子能系围裙在厨房做饭，自己是含着眼泪吃完了这顿饭。”

“孩子们从来不会因为谁多干了一点儿，自己少干了一点儿而沾沾自喜，更不

会觉得自己多干了一点儿而觉得吃亏。”程朋军感慨，这里的孩子们，衣服穿得不一定名贵，但他们经过教室时，看到窗台上掉下一把伞，会随手挂回去；进老师办公室时，看到扫把倒了，会自然扶起来，劳动已经内化成一种习惯。

今年6月，共青团中央、全国少工委发布《关于大力加强新时代学生团员、少先队员劳动教育的工作指引》，要求各级共青团、少先队组织，合理定位目标、设计内容，分阶段、接力式、持续性地开展劳动实践活动。今年7月，教育部印发《大中小学劳动教育指导纲要(试行)》，针对劳动教育是什么、教什么、怎么教等问题，细化有关要求，加强专业指导。

事实上，在此之前，全国不少学校都进行了劳动教育的探索。其中，不少学校与当地农业项目合作，设立劳动教育基地，让学生体验农业种植，因此，也有业

界人士提出，“劳动教育是不是就是带着学生种点花儿草草？”

对此，五一小学的教师们在长期的实践中总结出一个观点：新时代的劳动教育不只有“泥土”，还要有新内涵、新载体，因地制宜地开展活动。

近年来，该校探索开设了30多门少年宫社团课，确保人人参加；还开设六年成长必修课：一年级学舞蹈，二年级练足球，三年级玩乐器，四年级进修少年军校……确保每一个孩子在每一个阶段，有针对性地锻炼自己的动手能力。

在校，版画社团就将美育与劳动教育进行了融合。美术老师王帆介绍，版画的创作需经过起稿、印板、刻制、拓印等多个步骤，整个创作过程可以锻炼学生的细心、耐心和逻辑思维。

中青报·中青网记者采访的当天，该校的版画社团和陶泥社团正在开展活

动。课程结束后，学生们第一件事是迅速整理自己的工位。不一会儿，桌面被收拾得整整齐齐，地面也是干干净净。

体育老师张志认为，体育教育也是让学生养成吃苦耐劳品质的过程。“赛前的服装准备、饮食调整，赛后的个人卫生等，我们要求学生自己动手，每次训练完，队长总是主动带头，带着队员把器材归整好，将训练背心、球鞋带回家清洗干净。在他看来，‘与其喊破嗓子，不如做出样子，劳动教育要体现在各个方面’。”

考虑到家长大多是在外务工人员，平时忙于生计，该校坚持开门办学，开展“家长开放日”和“家长当老师”等活动，把家长从“看客”转变为“参与者”。“有的家长是厨师，就请他来教室，用电磁炉演示做菜；有家长在工地干活儿，就请他来讲解建筑相关的知识。”程朋军介绍。

“生活即教育，社会即学校，努力让家长也成为好老师，将劳动的种子种进家庭和社区的土壤里，让孩子尊重父母所从事的劳动。”在他看来，劳动只是手段，最终目的是教育，在劳动中发掘对孩子有价值的东西，将劳动真正融入生活，让学生未来能在社会上更好地立足，才是劳动教育的应有之义。



五一小学学生在该校百草园里劳动。韦豹摄



五一小学学生的版画作品展览。韦豹摄



五一小学女足队正在训练。王海涵摄



五一小学学生在社团学习版画。王磊摄

数说

中青报·中青网记者 张茜

中外合作办学能否成为留学“替代品”

中国教育在线发布本科阶段中外合作办学数据调查报告

大幅提升。

据了解，中外合作办学是指中国教育机构与外国教育机构依法在中国境内合作举办以中国公民为主要招生对象的教育教学活动。从办学形式来看，中外合作办学有“中外合作办学机构”和“中外合作办学项目(专业)”两种形式。“中外合作办学机构”是指经教育部批准的外国高校同中国高校在中国境内合作举办的以中国公民为主要招生对象的教育机构。“中外合作办学项目”是指中外合

作办学不设立专门的教育机构，而是直接在某个大学的某一学科或某个专业直接开展合作。

要探讨中外合作办学能否成为留学“替代品”，首先绕不开“教学质量”这个重要议题。

报告显示，自1995年《中外合作办学暂行规定》发布以来，中外合作办学机构和项目实现“快速增长”。截至2019年年底，全国已有600余所高校举办中外合作办学机构和项目。在137所“双一流”

建设高校中，举办有中外合作办学机构或项目的超过86%。“双一流”建设高校中外合作办学机构及项目中，约20%的外方合作院校为QS世界大学排名前200名的高校。

报告指出，近年来，中外合作办学发展进入“质量提升阶段”。同时，报告提到，中外合作办学项目就业统计数据显著向好，就业率和就业质量持续提升，尤其在出国(境)升学方面具有突出优势，毕业生多数进入国(境)外一流高校深造。

以北京某“双一流”建设高校中外合作办学机构2019年毕业生的情况为例，其继续选择合作院校硕士项目的学生比例为56.6%，申请其它国(境)外高校的学生比例为34%。

同时，家长和学生在和留学作比较时，中外合作办学的学费也是最常见考虑因素之一。

报告显示，关于学费，中外合作办学项目相对国内普通高校专业学习费用较高，是普通高校专业的数倍。中外合作办

学项目的学费差异很大，不同的办学地区、不同的合作院校、不同的专业，学费各不相同。

具体而言，中外合作办学项目学费在1.5万元/年-10万元/年，大多数为2万元/年-4万元/年左右。报告解释，中外合作办学高收费有其原因。通常情况下，收费较低的合作办学项目，多半采用的是国外的教材，而教学仍以国内教师为主；收费较高的中外合作办学项目，外方教师比重增加，更与国际接轨。

报告指出，由于中外合作办学项目或机构收费相对高昂，在招生的录取分数线上，多数中外合作办学项目录取分数线低于非中外合作办学项目，但差距在逐渐缩小。

报告认为，中外合作办学项目和机构(非独立法人)录取的生源质量在提升，这也说明考生和家长对中外合作办学质量的认可程度在提升。